

戏剧创作学习资料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专辑之二

4

江西省文化局戏剧创作研究室

1966.2

目 录

评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	許德政 張錫厚 樂貴明 (1)
再三宣扬剝削阶级道德怎么能说出于“糊涂”?	 周长贵 (10)
究竟为什么歌颂海瑞.....	曾庆瑞 (20)
封建道德继承论是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精神武器.....	赵凤歧 (26)
从吴晗同志的清官观点看他的国家观和道德观.....	马泽民 (34)
在绝对化的背后.....	孺子牛 (41)
“大喝一声,不许假冒!”.....	方延梁 (47)
此地无银三百两!.....	关 鋒 (52)
颠倒了历史的《海瑞罢官》.....	史 軍 (57)
这是什么样的“自我批评”.....	蔡尚思 (63)
从“投献”看吴晗的“自我批评”.....	罗思鼎 (68)
《海瑞罢官》的艺术表现错在哪里?.....	吴蔭循 (73)
拆穿“退田”的西洋鏡.....	罗思鼎 (78)
为什么坚持这个“看法”?.....	余心泽 (83)

——評吳晗同志《自我批評》里对清官的認識

吴晗同志为什么要坚持歌颂清官?.....	万木春 (89)
评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历史观.....	馬 岩 (97)
是强调阶级分析,还是反对阶级分析?.....	武慰萱 (109)

——評吳晗同志在历史人物評價問題上的錯誤观点

苏松地区阶级斗争的历史不容歪曲.....	蔡少卿 (118)
揭露“当时当地标准”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	王銳生 (126)
有关吴晗同志“自我批评”的两个问题.....	王 起 (133)
吴晗同志“继承”了什么?.....	陆 实 傅仲炎 (137)

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吴 晗 (141)
--------------------	-----------

評吳晗同志《關於〈海瑞罷官〉 的自我批評》

許德政 張錫厚 欒貴明

在《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一文中，吳晗同志進行了自我批評，並表示以後還要繼續檢查，我們歡迎。

但是，我們認為這篇自我批評的文章是不深刻的，含混的，自相矛盾的，許多地方實質上並沒有改變過去的錯誤觀點。我們願意就以下三個方面談談我們的看法。

一、是自我批評，還是自我辯護？

吳晗同志在自我批評文章的開頭，先把自己研究海瑞的文章按寫作時間排了個隊，鄭重聲明：“除了《海瑞罷官》的序文以外，都是一九六〇年以前寫的”^①，其中《論海瑞》一文，則是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作的。光看這個聲明，還不易理解作者用意何在，但聯繫他的自我批評的文章第四部分的内容來看，就比較清楚了。作者說：“儘管在上面已經說過這個劇本是在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寫成的，但是《北京文藝》的發表，北京京劇團的演出，卻是一九六一年年初的事，出單行本是在這一年的八月。這一年，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社會上刮過一陣‘單干風’、‘翻案風’，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要求‘退田’等等……”言下之意是：寫作這個劇本與一九六一年的幾股歪風毫無瓜葛，並非是這幾股歪風吹起來的，也不是當時階級鬥爭的反映。事實僅僅是：《海瑞罷官》的發表、演出、出版的日期與這陣歪風吹刮的時

注：① 凡引文未注明出處的，均見吳晗：《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一文。

间巧合而已；而剧中的“反霸”、“退田”诸情节，也仅仅是跟当时阶级敌人提出的要“平冤狱”，要“退田”偶合而已。至于读者和观众当时读了看了以后，很自然地跟当时歪风联系起来，虽然其效果是“严重的恶劣的”，但是，我塑造了农民“救星”海青天形象的动机未必不好。尽管吴晗同志对剧本在社会实践中的恶劣影响作了检查，说“决不能也不可以用任何理由来推卸这个责任，这个错误。”同时又说，这个恶劣效果是“读者、观众感觉到”和“理解”出来的。那么吴晗同志就可以把《海瑞罢官》借古非今的反动作用推得一千二净。而他到底为什么要研究海瑞，《海瑞罢官》反映了什么，要今天的人民和干部向海瑞学什么等实质性问题，避不作答，或含糊地说什么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

显然，吴晗同志最害怕承认《海瑞罢官》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一事实。因此，首先费尽心机证明剧本完稿时间是在一九六一年之前，与歪风无干。

诚然，评论一部作品，必须联系写作的时间和时代背景。但是阶级斗争浪潮的起伏，通常只能划出个大体时间，在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进攻的同时，也就酝酿着对方的反攻。就大的范围而言，何时起，何时伏，何时进攻，何时反攻，是没法以十天半月的时间来划出精确界限的。作为上层建筑物的文艺作品，再现阶级斗争的状况时，时间的先后差距就更大了。有的人反应敏捷，“一马当先”，就早一些；有的暗作准备，伺机抛出，就迟一些。主张“单干”，要求“翻案”，提倡“复古”，虽然是一九六一年左右逐渐形成一股逆流，但却不是自一九六一年始。社会主义革命跟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始终相伴随的。《海瑞罢官》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产生，正是诸如此类反社会主义作品大量出现的一颗信号弹，是当时阶级斗争风雨中，较早露头的一棵毒草。

在自我批评的文章中，吴晗同志不惜笔墨，征引了大量的史料，并就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特点，告状和除霸，退田和修吴淞江，大做文章。为什么吴晗同志在检查自己的错误观点时，忽然又热衷于对史料的挖掘和堆积呢？这无非是为了证明海瑞确是真的，

海大人确是有功劳的，做的事对当时农民确是有利的。你看一切都有史可征，一切都是持之有故的。

我们从吴晗同志自我批评文章的史料运用中仍可看出，吴晗同志对待史料的错误态度，借用历史研究的盾牌遮掩自己错误观点的做法，基本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吴晗同志对待史料一向是缺乏分析批判的。他认为《史记》是“实录”，是真实的纪录。二十四史大部分是以皇帝“起居注”为中心的“实录”^①。吴晗同志不厌其烦地引证这许多史料，除了为自己错误论点寻找历史根据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难道有了古籍记载，吴晗同志的错误论点就能站住脚了吗？列宁曾经说过：“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统计学和社会科学》《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七九页）

这段话不也概括地说明吴晗同志论战中的根本弱点吗？其实，象“入官田四万亩”的事实，究竟那个对，那个错，是无关大局的，正如吴晗同志将海瑞做了九个月巡抚误作七个月，将修吴淞江用了两个月误作一个月一样，毕竟是无关大局的。问题在于必须说明错误的实质，而不是转移注意力，去作一些无济于事的枝节的考订。更不能从封建时代的故纸堆中剔掇片言只语，姿意解释，混淆视听。吴晗同志这种别有用心地摘引大量所谓“史实”，只能被看做是他在利用“史实”进行诡辩。

吴晗同志承认，《论海瑞》这篇文章中许多说法“都是浮夸的，自相矛盾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在自我检查这篇文章里，仍旧未能摆脱那种自相矛盾。他一会儿说海瑞是“完完全全站

① 吴晗：《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

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一会儿又说海瑞“撞在地主政权、专制政治基础上，他就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他一会儿说自己“政治上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一会儿又说，自己是“站错了立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真使人眼花缭乱。

为什么会有这许多矛盾呢？我们认为吴晗同志还缺乏彻底承认错误的决心和勇气，还未能深入检查自己错误的根源。虽然硬给自己扣上了许多帽子，但在许多问题上并未想通。因此在承认错误的同时，又极力替自己的错误辩护。我们认为，自我批评实质上是自我辩护。当然，如果是合情合理的辩解，我们也是欢迎的；如果是狡辩，那么，也终将是徒劳的。

二、是忘记了阶级斗争，还是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吴晗同志说，“我忘记了阶级斗争”，完全忘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都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才写出《海瑞罢官》的。因而，“《海瑞罢官》却一点时代的气息也闻不到了”。难道说吴晗同志真是这样“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来写《海瑞罢官》的吗？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吧！他说，《论海瑞》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写成的，“研究海瑞，学习海瑞”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是有益处的，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又说：“《海瑞罢官》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既然写作《论海瑞》是“有现实意义的”，为什么在具“有现实意义的”《论海瑞》的基础上而写成的《海瑞罢官》，就一变而为“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的东西呢？在《海瑞罢官》上演不久，我们还听他说过写历史书、历史剧里面的历史人物，“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也就是为了继承前人的斗争经验教训，使之成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作到古为今用，这两者是统一的，不容有任何怀疑的”①。把这些话和今天的自我批评两相对照，真是南辕北辙，很难自圆其说。

① 吴晗：《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

事实上，吴晗同志在写历史剧时，既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忘记阶级斗争。而《海瑞罢官》正是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突出的反映。

吴晗同志说，《海瑞罢官》的错误是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当作了剧本的主题。好象他是由于写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才抹煞阶级斗争的本质似的。事实上，《海瑞罢官》并不是单纯写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它也写了以洪阿兰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同以徐阶为首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矛盾。问题在于，剧中的海瑞是以“仗义执法”，“为民作主”的面貌来处理与调和这两个对立阶级的矛盾。海瑞在剧中的立场、态度基本上是站在洪阿兰这一边，同以徐阶为首的另一方进行斗争的，如果说徐阶与海瑞的矛盾属于剧本所要表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那么这种斗争也只能是一种从属地位，它根本不可能替代两个对立阶级的矛盾冲突这条主线。可是，吴晗同志现在却硬说错误在于没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企图以此掩饰《海瑞罢官》中旨在颂扬只靠“王法”“清官”来调和阶级斗争的错误事实。

在告状和除霸的问题上，吴晗同志列举很多史料来考证苏松“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农民对乡官的阶级斗争”，所以阶级斗争的形式也就表现为“农民大量逃亡”，“逃亡不了的便采取告状，告乡官夺产，大量的人告状，经常告状”。以此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吴晗同志不仅在《海瑞罢官》里对告状、除霸作了讴歌，就是在这篇文章里依旧还是对农民告状大加颂扬，虽然他一再说什么告状是“低级的阶级斗争形式”，但字里行间却掩盖不住他内心的赞赏。我们不禁要问，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里，封建时代农民告状对推动阶级斗争的发展，社会历史的前进，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情况下，侈谈农民告状的意义，到底是要宣扬什么呢？要谁去告状呢，告谁的状呢？《海瑞罢官》出现的同时，就有人煽风点火，唆使人们去告状，“为民请命”，说这不好，那不好，这个早了，那个糟了，以达到翻案的目的。吴晗同志那么热衷于颂扬告状，难道也是偶然的吗？难道不是符合那些牛鬼蛇神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需要吗？

就以剧本中关于除霸和退田的描写为例吧。为什么吴晗同志特别赞扬除霸和退田，并以这两件事为主要情节呢？吴晗同志的答复是，海瑞一生做官的四个时期，只有任应天巡抚时期，过去还没有写过戏，可以写。而在这任期内，他主要做了五件事，前三件事不好写，就选择了除霸和退田两件事为主题”。似乎吴晗同志写除霸和退田，是客观条件使然的，是无法作其他选择的。

问题首先是为什么要写海瑞？这创作灵感从何而来？是什么事件触动了作者的心灵？既然已有过《五彩舆》《大红袍》《海瑞上疏》等描写海瑞的戏，为什么还要写。是不是因为以前剧本里海瑞形象不够高大，不足以教育今人，需要另行塑造。抑是过去剧本里没有突出除霸和退田，不足以表现海瑞的真正功绩，并“使之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创作绝不可能是脱离现实斗争的孤立现象。即使写的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作者对某一事件的看法、态度。在阶级敌人大喊要退田单干、大喊要翻案，以此向人民公社制度，向无产阶级专政疯狂进攻的时刻，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却宣扬“除霸”、“退田”，难道这不表明吴晗同志支持什么，反映什么人的要求，难道这不就是阶级斗争吗？

总之，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写历史剧，并没有脱离政治、脱离现实，也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一句话，他的理论文章和创作的历史剧，为无产阶级的敌人提供了进攻武器，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三、是糊涂，还是清醒？

吴晗同志说：“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在联系到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时，他又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时候是清醒的，例如我曾说过：时代不同，社会性质不同，道德标准也就不同……，……这就是正确的。但有时候又糊涂了。”在论及对清官的看法时，吴晗同志引述了一大段过去的文章，并说：“今天检查起来，这个看法我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改变。问题是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是“因此，他们在当时被

人民叫做青天，在历史上也就应该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在牵涉到历史人物评价时，吴晗同志说：“我曾经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活动’。这是正确的。但又说：‘评价历史人物是依据今时今地的标准呢？还是依据当时当地的标准？’这就有问题了”。关于《海瑞罢官》，吴晗同志说“我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指出他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这是正确的。但是……”

象这样对自己的观点又肯定又否定的手法，在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里是贯串始终，比比皆是的。它好似在告诉读者：我吴晗在许多基本观点上是正确的，但是有时却有点不对头了；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清醒的，但有时却不知怎么一来，糊涂了。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吴晗同志认为“一方面，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以至还有封建的东西，没有注意，没有警惕，反而自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放松了自我改造，问题就出在这里！毛病也就出在这里！”

很难相信，一个人在政治上的阶级立场，会同其学术上的阶级立场互相对立。要是果如吴晗同志所说，在学术研究领域里强调政治不成为一句空话吗？学术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它不可能是跟政治挂帅平行的、互相独立的、互不影响的。吴晗同志如不承认这点，那么他在自我批评中，又怎么能“认识到这不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呢？

既然“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那么，为什么偏偏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写出歌颂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清官”的作品来呢？毛主席说过：“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卷三，874页）作为历史学专

家，突然“破门而出”写京剧，大肆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清官”，大声疾呼向海瑞学习，这难道不是阶级感情的自然流露，不是政治观点的反映吗？

吴晗同志承认把海瑞歌颂得过了头，但又把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形式主义地看问题，认为好的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没有历史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我们认为这是并不高明的遁辞。吴晗同志明明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指出“他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显然吴晗同志早已看出海瑞政治作为是有益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是坏事。为什么吴晗同志却不会犯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的毛病，不把海瑞大大地贬抑一通呢？

吴晗同志处处运用唯心主义史观研究历史，歌颂封建统治阶级的英雄人物，提倡向古人学习，继承封建道德，为帝王将相在历史教材和艺术舞台上争取更重要的地位。口说笔写，不遗余力。而对于“极力想避免对帝王将相的歌颂，以免丧失立场”的历史教材编写人，他是颇不以为然的，他愤愤地说：“写在书上的尽是这个皇朝如何坏，农民起义推翻了它，另一皇朝起来了，又如何坏，农民起义又推翻了它，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①。”为了纠正这一切“皆坏倾向”，吴晗同志竭力扫清历史的漆黑烟雾，抹出了几块“青天”来，况钟是“青天”，周忱是“青天”，海瑞也是“青天”。在吴晗同志的笔下，不少帝王将相变成了大好人，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许多晴朗的天空。借以证明“并不是如有人所说的，一部二十四史都是人吃人的时代，也曾有过光明的时代”②。

从吴晗同志连篇累牍的论著中，可以窥见其唯心史观体系的梗概，他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针对的，是动于衷而后形于言的，下笔时头脑是清醒的，行动也是自觉的。《海瑞罢官》之作正是其反动的唯心史观的艺术形象的体现。

人人皆知，这个历史剧的写作目的早已昭然若揭，而现在吴

① 吴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② 吴晗：《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

哈同志却说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这种推糊涂的态度，难道能证明这是“感谢并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的诚意吗？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必须用来指导斗争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光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实际不接受，并不能说是真正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吴晗曾经说过：“有人问先学理论还是先学历史？我看先学历史后学理论。抓住实际的东西来检验理论，否则理论与什么结合呢？”①吴晗同志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或者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装样子，结果必然是以唯心主义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以致一错再错，走上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以上是我们的一些看法，很不成熟，不妥之处，请批评。

（原载1965年12月31日《北京日报》）

① 吴晗：《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65年12月31日。

再三宣揚剝削階級道德怎麼

能說出於“糊塗”？

閻 夫 貴

在吳晗同志寫的許多歌頌海瑞的文章中，《論海瑞》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篇。《海瑞罷官》就是把這里所塑造的海瑞用藝術形象再現於舞臺。如果說，其他文章都是寫海瑞的一枝一節，這篇文章則是描寫海瑞一生的全貌。這篇文章涉及的問題很多，這里只拿吳晗同志要我們學習海瑞的品德一個問題來討論。在這篇文章中，吳晗同志特別突出地號召人們向海瑞學習“他一生反對壞人壞事”；“一生反對貪污，反對奢侈浪費，反對鄉愿”；“一生處處事事為百姓設想，為民謀利”；“一生不向困難低頭，百折不撓的鬥爭精神”；“一生言行一致，里外如一的實踐精神”。而且他認為“這些品質，都是我們今天所需要學習和提倡的”。

最近，吳晗同志在一篇“自我批評”的文章中，仍然肯定他這篇文章有“現實政治意義”。又說，在道德批判繼承問題上，宣揚封建道德是出於有時“糊塗”。（見《北京日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這就不能不使我們看看吳晗同志在《論海瑞》中究竟把海瑞塑造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他的道德繼承論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現實政治意義”又究竟是什麼？

海瑞究竟是為哪個階級服務的官？

我們看到，吳晗同志在描寫海瑞的“優秀”品德時，總是說海瑞“一生”怎樣怎樣，不言而喻，這是極言海瑞思想境界之高，海瑞是一個璧玉無瑕，最高尚、最純粹的人！

吳晗同志說：海瑞“一生處處事事為百姓設想，為民謀利”。

这也就是说，吴晗同志认为，海瑞“完全”、“彻底”地为农民服务，全心全意地为农民服务。但是，这可能吗？人们不禁要问：海瑞究竟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官？在文章中，有时也看到吴晗同志说一两句海瑞“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海瑞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是忠君爱国的”之类的话。“忠君”、“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站在农民一边”、全心全意地为农民服务是根本对立的。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就不能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站在农民一边”，全心全意地为农民服务，就不能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对一个阶级有利，也就是对另一个阶级有害。吴晗同志硬是把地主阶级的利益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合二而一”，把一心一意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官吏描写成农民的“救星”，这仅仅是评价高一点的问题吗？据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的文章中说，他自己的“立场错了”，但是，错误的立场又怎么能够写出有积极的“现实政治意义”的东西呢？作品的“现实政治意义”的方向是由作者的立场决定的，吴晗同志既然承认自己的“立场错了”，又仍然肯定《论海瑞》的“现实政治意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即此一端，吴晗同志“自我批评”的“诚心诚意”是大可怀疑的。

吴晗同志说：海瑞“一生反对坏人坏事，从没有反对过好人好事”。但是，什么是好人好事，什么是坏人坏事？对立的阶级有着完全相反的标准。在无产阶级看来，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起义农民、农民起义是好人好事。但在地主阶级看来，这却是坏人坏事。那么海瑞对起义农民抱什么态度呢？对明史资料“非常熟”的吴晗同志总不会不知道，海瑞主张对起义农民采用“杀伐抚绥，并举不遗”、“用兵安民，并行不悖”的反革命两手吧？按照无产阶级的观点，海瑞反对农民起义，这不是反对好人好事吗？吴晗同志口口声声讲历史真实，“从当时当地的情况出发”，可是对那些特别能够表明海瑞阶级立场的事实恣意隐瞒，这难道就是吴晗同志所主张的历史真实吗？

吴晗同志歌颂、肯定海瑞的“斗争精神”、“实践精神”、“刚直不阿”（见《海瑞罢官》的剧情说明）。试问：有什么抽象

的“斗争精神”、“刚直不阿”吗？海瑞向谁斗争？为谁斗争？难道不是为地主阶级利益斗争？为地主阶级的利益实践？吴晗同志完全抽掉了“斗争精神”、“实践精神”、“刚直不阿”的阶级内容，加以渲染、鼓吹，这是资产阶级学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惯用的手法。

所谓“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言行一致，里外如一”等等，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这样的品质，因此，我们不仅要问：海瑞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官？而且还要问：海瑞是四百多年前地主阶级的分子，还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写到这里，我们想起了周恩来同志对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同志的精神品质的概括：“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大家比比看，吴晗同志对海瑞的描写和周恩来同志对雷锋同志精神品质的概括有什么区别？不难看出，吴晗同志也把描写共产主义战士精神品质的一些名词加在地主阶级分子海瑞的头上。

实用主义者胡适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胡适文存》第二卷，第一〇六页）有许多的历史事实都证明，海瑞是一个忠心耿耿、死心踏地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官，然而吴晗同志竟随心所欲地把他“涂抹”、“装扮”成农民的“救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观点？吴晗同志声称，他写海瑞是为了反对歪曲海瑞，难道吴晗同志本人不正是一个歪曲海瑞的典型吗？

吴晗同志说：“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人民立场，工人阶级立场的海瑞，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海瑞，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厅主义的海瑞，深入群众、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海瑞。”吴晗同志在这里所说的一些精神品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当然是需要的，但是有什么必要为这些品质打上海瑞的印记？难道这不是混淆、抹煞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思想界限吗？而且更重要的是吴晗同志企图通过这些美丽、动听的名词，把满脑子封建道德的海瑞当作社会

主义时代人们学习的榜样。所谓“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也只不过是一句假话。

封建士大夫赞扬海瑞：“行为国栋，德足世仪”，“当朝伟人，万代瞻仰”。吴晗同志说：“封建时代的海瑞还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两种说法一脉相承。而且吴晗同志讴歌、美化海瑞，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达到了“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的地步。

无产阶级究竟从哪里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封建道德真的有什么东西值得社会主义时代人们学习吗？海瑞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吴晗同志为什么把他推崇为社会主义时代人们全面学习的榜样？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考察一下吴晗同志关于道德继承的看法。

关于道德继承问题，吴晗同志几乎一有机会就讲，并且写了《说道德》《再说道德》《三说道德》三篇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阐述这个问题。现在，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居然说，他有时“糊涂”了。这是一种骗人的说法！

无产阶级从哪里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也就是说，共产主义道德的源泉在哪里？这是决定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研究和宣传方向的重要问题。吴晗同志也正是从回答这个问题上提出他的道德继承论的。

吴晗同志在《说道德》中说：“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批判地吸取其中某些部分，使之起本质的变化，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生产服务。”在《再说道德》中又说：“无产阶级若不善于吸取过去统治阶级某些优良的东西”，那么只能“自己凭空创造”，而“自己凭空创造呢，也不大可能。”这就是说，照吴晗同志看来，无产阶级可以从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那里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历史上统治阶级的道德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

可以看到，在这里，吴晗同志是以理论的形式向我们表明：无产阶级只能学习历史上海瑞等统治阶级的人物的品德。

我们认为，吴晗同志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每个阶级都是从自己的经济条件、阶级地位以及它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的，无产阶级也不能例外。这就是说，共产主义道德的源泉是在无产阶级的经济条件、阶级地位以及它所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斗争中，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就是说从生产和交换所依以进行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反杜林论》第九五页）谈到共产主义道德时，列宁明确指出：“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五八页）然而吴晗同志竟认为无产阶级离开历史上统治阶级道德就是“凭空创造”，这种说法，根本否认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是一种从道德（历史上统治阶级的道德）引伸出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道德和历史上统治阶级道德产生的条件不同，共产主义道德和历史上统治阶级道德是根本对立的。

第一，历史上统治阶级道德——不论是地主阶级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都是直接维护剥削制、私有制的，论证剥削和压迫的合理性、正义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荀子说：“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贱而不肯事贵”是人之“不祥”。被吴晗同志推崇备至的海瑞也说：“以下事上，古之义也”，“义不可缺”，“理所当然”。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道德是为无产阶级在世界上消灭一切剥削制、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服务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共产主义道德“是为联合劳动者去反对一切剥削制，反对一切小私有制的这一斗争服务的”，“是用来破坏旧时剥削者社会，并把全体劳动大众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工人阶级周围的工具。”（《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四四四页）

既然剥削阶级道德是为剥削阶级维护剥削制服务的，共产主义

道德是为无产阶级反对剥削制服务的，那么吴晗同志却认为，对历史上统治阶级道德不是清除，而是革新，使之起“本质变化”，从而为无产阶级服务。试想，这怎么可能呢？

剥削阶级道德的本质是不能改变的，只能打倒。吴晗同志所谓使历史上统治阶级道德起本质变化的说法，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

第二，历史上统治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人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就是历史上统治阶级的信条。地主为了发展自己，必须剥削农民；资本家为了发展自己，必须使无数的工人挨饿。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痛苦的基础上，这就是历史上统治阶级道德的根本特征。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集体主义。刘少奇同志指出：共产主义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四十页）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犹如水火，是不能相容的。

第三，历史上统治阶级道德都是建立在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统治阶级为了使人民“心甘情愿”地忍受他们压迫和剥削，他们不是把他们的道德说成“神的旨意”，“天经地义”，就是把他们的道德说成人的本性的体现，用这来欺骗人民。列宁在驳斥资产阶级责备无产阶级摒弃一切道德时，指出：“我们摒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五八页）与历史上统治阶级道德不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道德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它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由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一致，无产阶级总是公开申明自己道德的阶级性。

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崇高的道德，它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这种道德，历史上各个统治阶级没有